



血雨腥风育遗孤 和平岁月援宁夏 (一)

——马骏烈士夫人杨秀蓉来宁前后

拜学英

马骏烈士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优秀党员，“五四”时期京津地区著名学生运动领袖和活动家，东北地区地下党组织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中共北平市委早期领导人，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同学和亲密战友。马骏烈士的事迹早已载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本文试对马骏烈士的夫人、曾任自治区三届政协常委的杨秀蓉在血雨腥雨的岁月里艰难抚育子女成人。新中国成立后响应党和国家号召，举家从东北来到大西北，支援宁夏建设的往事以追记。

支持丈夫闹革命

杨秀蓉祖籍山东济南，先祖曾与马骏家族为远亲，一同闯关东落居吉林宁安县(旧名宁古塔)，今黑龙江宁安市。经过两代人的艰难创业经营，山东闯关东的马家、张家、白家、麻家在宁安县渐有名声，马骏的父亲马喜贵凭着较强的创业和办事能力，兴办起了学校，并经营“元和盛”烧锅和“增元兴”面粉厂，创下了一份家业，家境殷实。1920年，马喜贵曾赴天津营救被捕的马骏、周恩来等爱国学生。1925年7月，因支持马骏从事革命活动遭敌人杀害，被周恩来称为“机智开明的老爷子”。杨秀蓉的父亲也曾在宁安经营牛羊肉小本生意，规模、名气远不如马骏父亲。

1895年9月出生的马骏在宁安读完小学进入吉林省第一中学读书。1915年8月考入天津私立南开学校，结识了周恩来、邓颖超等人，共同的理想志趣使他们成为密友。杨秀蓉受宁安一带习俗影响，未能进入学校读书，但她反对封建礼教，性格开朗，思想进步。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作为京津地区学生运动领袖，马骏始终站在运动最前列，与反动派进行坚决斗争。1919年10月16日，日本帝国主义在福州枪杀

爱国学生，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福州惨案”，马骏、周恩来等闻讯后领导天津学生和群众声援，开展抵制日货斗争。当局于1920年1月23日先后逮捕了马骏、周恩来、郭隆真等26人。在狱中，他们用绝食方式与反动当局进行斗争。周恩来、马骏在监狱里赋诗，激励狱外的战友们坚持斗争，后经各界群众和爱国学生坚决斗争，被捕半年之久的周恩来、马骏等爱国志士得以释放。1920年马骏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马骏在南开学校毕业回到宁安老家，在父亲的操办下与杨秀蓉结婚。杨秀蓉虽受当时环境和条件所限未进过学堂，但她从小受家庭熏陶，正直开朗，刚毅坚强，明事理，对社会的黑暗与不公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全力支持丈夫从事党的工作，从不拖丈夫后腿。他们是一对恩爱夫妻，结婚十年聚少离多，相聚的时光加起来不到一年，杨秀蓉始终义无反顾地支持坚信丈夫从事的事业，是一对志同道合的一对革命伉俪。

1922年2月，中共北平地方执行委员会派马骏到

哈尔滨从事地下工作，他利用《晨光报》开展活动，又和韩铁生等人组织“救国唤醒团”，参与组织和领导哈尔滨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作为东北地区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马骏在家乡宁安创立了吉林第一个党小组，也是东北地区最早的党小组。为了开展革命活动，他经常奔走在宁安、吉林、哈尔滨、长春、四平、牡丹江、海参崴等地。马骏还以吉林毓文中学教师身份为掩护，在师生中宣传马列主义和十月革命，在学生中发展党员，为东北地区培养了大批革命青年骨干。“五卅惨案”发生后，马骏任“吉林沪案后援会”会长，组织领导了声势浩大的声援爱国运动。

结婚后的马骏几乎常年在外从事革命工作，无暇顾及家庭，杨秀蓉在家操持家务。1921年11月11日，长子马德铸出生；1923年8月18日，次子马德钟出生；1925年1月25日，女儿马德芳出生。孩子们几乎都由杨秀蓉抚育。杨秀蓉后来回忆说，丈夫身上常带着一个很精致的黑皮笔记本，睡觉时也装在身上，记录着地下党和工作上的事情，后来不知去向，很可能是丈夫被捕前烧毁了。

只身赴京救夫君

马骏在血雨腥风的白色恐怖中从事革命工作，坚信共产主义，在困难和危险面前，他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英勇奋战。

1924年至1925年他在东北从事革命工作时，共产国际派人与他联系，为便于工作在绥芬河购买了一座火磨，以此为据点和掩护开展工作。一次马骏和几个同事与父亲乘坐一位姓麻的山东人开办的公交车由绥芬河回宁安老家，半道上遭遇国民党民团的盘查，马骏等趁机逃脱，民团抓住马骏父亲，传话让马骏来换父亲。一天杨秀蓉正在家里管孩子，突然听见敲门声，她赶忙去开门却不见人影，只见地上放在一个布包袱，包着一双鞋和人的两个耳朵。家人见状，分析认为继续呆在家里凶多吉少。一家人趁着冬天的黑夜，冒着严寒从宁安到牡丹江，又辗转至沈阳暂时安身。

1925年10月，马骏受李大钊驰函派遣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中山大学，马骏担任学生公社书记职务，负责党务工作，系统学习了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

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背叛革命，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民党反动派在全国到处疯狂逮捕和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人李大钊等20多位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北平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1927年夏，受党的指示，马骏秘密回国，他先到武汉联系上党组织接受任务后，与谭少云在邓颖超、刘清涛的护送下上了武汉发往上海的火车，由上海坐轮船到天津，地下党派人送他们抵达北平。因是秘密回国，马骏不能与家人联系和见面，只好在途经上海时，把从莫斯科带回的两个小孩围嘴和一双小皮鞋邮递回东北老家，一则告知他已回国的消息，二则告慰家人和孩子，谁料竟是与家人未能见面的永别。杨秀蓉后来在纪念马骏烈士牺牲35周年时发表在1963年2月15日《宁夏日报》上的纪念文章《悼念马骏烈士逝世35周年》一文里写道：“1927年夏天，突然接到他从上海为孩子们寄来的两个围嘴。不久，从他北京的弟弟那儿得知，他已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归来。瞧着这两个围嘴，就

使我想到他一生的斗争，不正是为了祖国的明天，为了孩子们的未来吗？如今我还保留着他寄回来的围嘴。”

马骏就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兼组织部长，负责恢复遭重创的北平党组织工作。为防不测，有时化装成商人住饭店旅馆，有时化装教书先生或做工的，不断变化着装扮，多次到工厂、学校做工作。在马骏等人的努力下，北平党组织很快得以恢复。这期间，杨秀蓉仍在老家坚守操持家务，抚养孩子。

1927年12月3日，马骏在北平大栅栏一旅店秘密召开市委会议时，中共北平市委农民部长许锡仁被捕后无耻叛变，出卖同志，马骏等与会者不幸被捕。在狱中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严刑拷打，他大义凛然，宁死不屈，严守党的机密，表现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视死如归的崇高革命气节。张作霖来监牢里劝降马骏，马骏怒斥并郑重的写了两份材料：一份是“告东北同胞书”，揭露军阀勾结帝国主义，剥削压榨百姓的反动本质，号召人们起来革命；一份是“故共产党员马骏之墓”。大义凛然地对张作霖说：“前一份是写给东北老乡的，后一份是写给家人的，烦请转告，我死后立到我的坟头上”。张作霖大怒，下达了杀害马骏的执行令。

马骏被捕后，当局严密封锁消息，杨秀蓉和孩子们丝毫不知。一天，家里收到北平寄来的信，装着一份报纸，在报纸边上用阿拉伯文书写着马骏被捕的消息，家人请人翻译后得知消息后，紧急商议由杨秀蓉带着马骏的六弟和未见过父亲的三岁女儿赴北京营救。杨秀蓉到北京后，利用关系委托熟人花钱营救马骏。但得到的情况是，马骏刚被抓进去时，为使更多的地下党人不受牵连，承认了自己是北平地下党负责人身份。敌人劝降不成，想从他嘴里问出北平地下党组织的秘密，老虎凳等重刑都上了，马骏一句有用价值的话都没说，激怒了张作霖，其他人想尽办法也无法营救。杨秀蓉等只能在监牢里透过牢门的小孔远远望一眼马骏，

作者简介 拜学英，中国作协会员，宁夏文史馆研究员，现供职于宁夏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红色百宝箱 奋斗百年

一把藤椅见初心

“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系。”1962年，焦裕禄不顾自己的多病之躯，来到风沙、内涝、盐碱三害肆虐的河南省兰考县，担任县委书记。随后的475天里，他以坚强毅力、炽热情怀，带领人民群众战天斗地，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为改变兰考的贫困面貌，让大家过上好日子，他经常忍着剧烈的肝病，靠着一辆破自行车和一双铁脚板，走遍了兰考149个大队中的120多个，行程5000多华里，终于掌握了三害的第一手资料。”兰考县焦裕禄同志纪念馆馆长董亚娜说。

焦裕禄暗中忍受了多大的疾病痛苦？在兰考县焦裕禄同志纪念馆，一把被顶破的藤椅见证了这些感人至深的日日夜夜。

1963年9月，焦裕禄的肝病已非常严重，在开会、作报告、听汇报时，他总是把右脚踩在椅子上，高抬右膝顶着时时作痛的肝部。渐渐地，钢笔、茶杯盖、鸡毛掸子都成了他用来压迫止痛的工具。

“日子久了，他坐的藤椅右侧就被顶出了一个洞。病痛稍有缓解，焦裕禄便亲

自动手，用藤条把藤椅上的窟窿一点点补好。但不久，藤椅又被顶破。”董亚娜说。

曾有人试图换掉这把破藤椅。一名从条件稍好地区调来的干部提出装潢县委领导办公室，甚至连桌子、椅子、茶具，都要换一套新的。

焦裕禄知道后，提了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坐在破椅子上不能革命吗？”他还说：“灾区面貌没有改变，还大量吃着国家的统销粮，群众生活很困难。富丽堂皇的事，不但不能做，就是连想也很危险。”

1964年3月22日晚上，也就是焦裕禄去医院治病的前一天晚上，他就在这把藤椅上，忍着剧痛用颤抖的手写起《兰考人民多奇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这篇文章。遗憾的是，文章刚刚开了个头，病魔就迫使他放下了手中的笔。

焦裕禄去世后留下的东西并不多，时任兰考县委新闻干事刘俊生带着对焦书记的深厚感情，把他坐过的这把藤椅珍藏了起来。就这样，这把藤椅得以保存至今。(据新华社郑州电)

红色地标 话延安

为人民服务！依然熠熠生辉的“红色讲台”

“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了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延安枣园，《为人民服务》讲话纪念广场，无论天气晴朗或是阴雨，总有一批批参观者在这里齐整列队，高声诵读。77年前，一场载入史册的讲话曾在这里发表。

广场两侧，山岭环绕，草木葱茏。高达6米的张思德雕像静立于广场正中央，身姿英挺、目光炯炯。中轴线上镶嵌着的29颗五角星，象征着 he 短暂而光荣的一生。

1944年9月5日，29岁的张思德在执行烧炭任务时，即将挖成的炭窑突然坍塌，他奋力把战友推出窑口，自己却被埋在窑内，生命就此定格。

爬雪山、过草地，作战机智勇敢、奋不顾身；帮驻地老乡收割庄稼、修路、挑水；勇与恶狼搏斗，救回一个孩童……面对这样一位优秀青年的骤然离世，1944年9月8日，毛泽东怀着悲痛的心情，在延安枣园发表了著名的《为人民服务》讲话。

时光荏苒，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已融入无数共产党员的血脉，成为他们的信仰。

今天，在张思德牺牲的这片土地上，一支支张思德服务队活跃在千山万水间，张思德精神从未走远。清晨，天刚蒙蒙亮，国网延安供电公司枣园供电所张思德服务队队员王栋和郝李军已准备出发执行抢修任务。

“走访帮助辖区困难群众，确保24小时不间断抢修故障，虽然工作繁杂，但很有意义。”王栋说，服务队共有18名队员，肩负着辖区112平方公里、近6万名群众的生产生活供电保障任务。

“在延安有张思德服务队，在嘉兴我们成立了红船共产党员服务队，名称不同、目标一致。为人民服务是我们的职责，也是初心和使命。”前来延安参观学习的国网嘉兴南湖供电公司党委书记王宏韬说。

(据新华社西安电)

拾遗

“西湖稿”与“五四宪法”

杭州西子湖畔，北山街84号大院30号楼，坐落着一幢青砖叠砌的西式历史建筑。1953年12月28日至1954年3月14日，毛泽东率领宪法起草小组成员在这里度过了77个日夜，起草了宪法草案初稿(史称“西湖稿”)，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五四宪法”)的正式诞生奠定了重要基础。

1953年底，毛泽东一行乘专列离京赴杭。“治国，须有一部大法。我们这次去杭州，就是为了能集中精力做好这件立国安邦的大事。”列车上毛泽东对随行人员说。30号楼的工作持续了77天。1954年2月中旬至26日，宪法起草小组先后拿出了初稿、二读稿、三读稿。经杭州、北京两地人员分头讨论并修改后，3月上旬又完成了四读稿。接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四读稿。宪法起草小组在杭州的工作圆满结束。

1954年6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并予以公布，交付全民讨论。1.5亿余人参与、征集意见118万多条，根据这场全国大讨论中提出的意见，宪法起草委员会又对宪法草案做了一些修改。

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由此诞生。

(据《人民日报》)

砚台与清官

在宋代，砚台作为“文房四宝”之一备受文人雅士的喜爱，据说当时用一方名砚竟能换来一顶七品乌纱帽。然而，当名砚作为“雅贿”之物时，却失去了其风雅，被清正廉洁者拒之门外。

北宋初年，有一个官员想送给宰相吕蒙正一方宝砚，但怕碰壁难堪，便说要卖给他，夸耀此砚非同一般，并说10文钱卖给他。吕蒙正顿时明白，如此砚中之宝只要10文钱，且登门推销，其背后目的不言自明。于是，他对“卖砚者”说：“此方宝砚即使一天能呵出一担水来，也不过只值10文钱。我还是不要了。”

无独有偶，王安石善诗好文，且酷爱收藏文房四宝。于是，有一个地方官员投其所好，送来一方宝砚，当面对称赞宝砚的好处呵之即可得水。王安石听了后，笑着反问他：纵得一提水，又能值几何？羞得那人无言以答，只好收起宝砚灰溜溜地走了。

像吕、王这样拒绝“雅贿”、两袖清风的官员在宋朝不乏其人，《宋史》中就有包拯“不持一砚归”的故事。如今在肇庆的丽樵楼上一副对联颂扬包拯“不持一砚归”的高风亮节：“星岩朗耀光山海，砚渚清风播古今。”(据《天津日报》)

地道里的土电话

电影《地道战》中有这样一个场景：民兵队长高传宝用竹筒向地道里的民兵下达命令。这个竹筒是“喊话筒”，从高处往地道里传递信息主要靠它。河北省保定市清苑区冉庄地道战遗址管委会主任周明慧介绍：“在地道里面还有一种土电话，民兵将竹筒两头绑上猪鬃，中间穿上细绳，拉紧，利用绳子振动，就可以交流通信。”

在地道里作战，是抗日军民在斗争中摸索出的战法。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大举进犯华北。群众开始在偏僻、低洼的野外和村里挖隐蔽洞。最初的地洞为单口洞，不便于转移，一旦被敌人发现难免遭受损失。后来逐步把单口洞改成双口洞、三口洞，然后又逐步加宽加长，从隐蔽地洞发展成为地道。随着经验的积累，游击队和民兵开始挖掘“战斗型地道”。各家地道相连，便于机动，又增添了射击孔，用于打击敌人。地道与水井相通，既可通气又可取水排水。冉庄形成了以十字街为中心的4条地道主干线和向四面八方延伸的支线24条，全长达16公里。

地道战是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反“扫荡”的有效形式，是人民战争的重要内容。毛泽东同志说：“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将赢得战争，赢得和平，又赢得进步。正是依靠人民战争这个重要法宝，我们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伟大胜利。”(据《人民日报》)

溯源

“呆若木鸡”是褒是贬？

“呆若木鸡”一词，常用来形容一个人反应迟钝。无疑，在今天的语言环境中，它是一个贬义词，然而在这个词的发生之初，它却是一个褒义词。

“呆若木鸡”语出《庄子·达生》篇，讲的是纪渚子为齐宣王训练斗鸡的事。“呆若木鸡”在这里，指看上去就像木头鸡一样，虽然听到别的斗鸡鸣叫，但这只鸡已经完全不为所动，它的德性能力已经完全具备了，别的斗鸡没有敢来应战的，看到它都转身逃走了。庄子认为，外表凶狠、气势旺盛的斗鸡反而没有战斗力，它们虚张声势往往是因为内心恐惧或战斗经验不足。而内心强大、经验丰富的斗鸡往往收敛沉稳，以不变应万变，后发制人。“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大勇若怯”，都是这个道理。

心学大家王阳明也深谙这个道理，《明儒学案·王阳明传》记载王阳明曾奉命出征赣南，出征前他对弟子说：“阳明此行，必立事功。”弟子不解，王阳明解释说：“吾触之不动也。”王阳明认为自己此行必定胜利，因为他就像《庄子·达生》篇中描写的斗鸡一样，呆若木鸡、触之不动，对胜利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和信心。(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